

世界哲學家叢書

金岳霖

胡軍著

傅偉勳 / 韋政通 主編

東大圖書公司 印行



世界哲學家叢書

金 岳 霖

胡 軍 著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金岳霖／胡軍著．--初版．--臺北市：
東大出版；三民總經銷，民81
面；公分--(世界哲學家叢書)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ISBN 957-19-1431-2 (精裝)
ISBN 957-19-1432-0 (平裝)

1. 金岳霖—學識—哲學

128

81006105

◎ 金 岳 霖

著者 胡軍

發行人 劉仲文

著作財產權人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二樓

郵撥／〇二〇七一七五二〇號

初版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一月

編號 E 12083

基本定價 伍元壹角壹分

行政院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七號



ISBN 957-19-1432-0 (平裝)

「世界哲學家叢書」總序

本叢書的出版計劃原先出於三民書局董事長劉振強先生多年來的構想，曾先向政通提出，並希望我們兩人共同負責主編工作。一九八四年二月底，偉勳應邀訪問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三月中旬順道來臺，即與政通拜訪劉先生，在三民書局二樓辦公室商談有關叢書出版的初步計劃。我們十分贊同劉先生的構想，認為此套叢書（預計百冊以上）如能順利完成，當是學術文化出版事業的一大創舉與突破，也就當場答應劉先生的誠懇邀請，共同擔任叢書主編。兩人私下也為叢書的計劃討論多次，擬定了「撰稿細則」，以求各書可循的統一規格，尤其在內容上特別要求各書必須包括(1)原哲學思想家的生平；(2)時代背景與社會環境；(3)思想傳承與改造；(4)思想特徵及其獨創性；(5)歷史地位；(6)對後世的影響（包括歷代對他的評價），以及(7)思想的現代意義。

作為叢書主編，我們都了解到，以目前極有限的財源、人力與時間，要去完成多達三、四百冊的大規模而齊全的叢書，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光就人力一點來說，少數教授學者由於個人的某些困難（如筆債太多之類），不克參加；因此我們曾對較有餘力的簽約作者，暗示過繼續邀請他們多撰一兩本書的可能性。遺憾

的是，此刻在政治上整個中國仍然處於「一分為二」的艱苦狀態，加上馬列教條的種種限制，我們不可能邀請大陸學者參與撰寫工作。不過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獲得八十位以上海內外的學者精英全力支持，包括臺灣、香港、新加坡、澳洲、美國、西德與加拿大七個地區；難得的是，更包括了日本與大韓民國好多位名流學者加入叢書作者的陣容，增加不少叢書的國際光彩。韓國的國際退溪學會也在定期月刊《退溪學界消息》鄭重推薦叢書兩次，我們藉此機會表示謝意。

原則上，本叢書應該包括古今中外所有著名的哲學思想家，但是除了財源問題之外也有人才不足的實際困難。就西方哲學來說，一大半作者的專長與興趣都集中在現代哲學部門，反映着我們在近代哲學的專門人才不太充足。再就東方哲學而言，印度哲學部門很難找到適當的專家與作者；至於貫穿整個亞洲思想文化的佛教部門，在中、韓兩國的佛教思想家方面雖有十位左右的作者參加，日本佛教與印度佛教方面却仍近乎空白。人才與作者最多的是在儒家思想家這個部門，包括中、韓、日三國的儒學發展在內，最能令人滿意。總之，我們尋找叢書作者所遭遇到的這些困難，對於我們有一學術研究的重要啓示（或不如說是警號）：我們在印度思想、日本佛教以及西方哲學方面至今仍無高度的研究成果，我們必須早日設法彌補這些方面的人才缺失，以便提高我們的學術水平。相比之下，鄰邦日本一百多年來已造就了東西方哲學幾乎每一部門的專家學者，足資借鏡，有待我們迎頭趕上。

以儒、道、佛三家為主的中國哲學，可以說是傳統中國思想與文化的本有根基，有待我們經過一番批判的繼承與創造的發

展，重新提高它在世界哲學應有的地位。為了解決此一時代課題，我們實有必要重新比較中國哲學與（包括西方與日、韓、印等東方國家在內的）外國哲學的優劣長短，從中設法開闢一條合乎未來中國所需求的哲學理路。我們衷心盼望，本叢書將有助於讀者對此時代課題的深切關注與反思，且有助於中外哲學之間更進一步的交流與會通。

最後，我們應該強調，中國目前雖仍處於「一分為二」的政治局面，但是海峽兩岸的每一知識份子都應具有「文化中國」的共識共認，為了祖國傳統思想與文化的繼往開來承擔一份責任，這也是我們主編「世界哲學家叢書」的一大旨趣。

傅偉勳 韋政通

一九八六年五月四日

自序

一九八五年秋，我開始在北京大學哲學系攻讀碩士學位。第二學年準備學位論文時，我原擬做關於禪宗的思維方式或熊十力思想方面的論文。但我導師湯一介教授認為我具有一定的邏輯學方面的基礎知識和基本訓練，並有較強的哲學思辯能力和分析能力，因此，他建議我做關於金岳霖哲學思想的論文。我採納了湯先生的建議，於是決定先研究金岳霖的《論道》一書。此書系統地闡述了金岳霖的本體論哲學。

金岳霖哲學思想的特點在於用語精確、論證細密、分析透徹、思想深刻精湛且富有創造性。他的著作有很強的技術性。研讀他的著作，使我對他的哲學思辯能力和邏輯分析能力產生了無限的欽佩之情。他使我懂得了怎樣來運用哲學的分析方法及怎樣來論證一個哲學問題。

我之欽佩金岳霖的分析方法，從我自身來說，一個原因恐怕在於我本人也喜歡哲學分析的精神。我並不完全贊同分析哲學，但其分析的方法，在一定範圍內，是完全符合科學精神的。另一個原因在於我反對從一既定的思想框架出發來研究哲學史。當然，研究哲學史，不可能不從一定的思想觀點出發。但在研究中，我們却必須使這種思想傾向淡化，否則不可能對歷史上的哲

2 金 岳 霖

學思想做同情的瞭解。基於這種認識，我採用了分析的方法來剖析金岳霖的本體論哲學體系及其構造體系的原則。

取得碩士學位之後，我繼續在北京大學哲學系攻讀博士學位。我導師湯一介教授建議我的博士學位論文以金岳霖的另一本哲學名著《知識論》為內容。

金岳霖的《知識論》一書是中國哲學界第一部系統的知識理論著作，它是接着西方哲學傳統講的。一般的說來，中國傳統哲學並不關注知識問題的研究。然而和在西方社會一樣，知識在中國社會，尤其是在中國現代社會，發揮着愈益巨大的作用。因此中國哲學應重視對知識論的研究。從這方面說，研究金岳霖的知識理論有一定的理論的和現實的意義。但應該注意的是，金岳霖的《知識論》一書大體上是總結了西方哲學三十年代左右關於知識理論研究的成果。從現代知識理論的角度看，其中有些觀點已經陳舊。這樣，我們現在研究《知識論》一書的思想，就不能停留在其原有的水平上，而應把它放在知識理論現代發展趨勢的坐標上來考察。根據這一想法，我對金岳霖《知識論》的研究就不滿足於停留在客觀分析的層面上。

哲學史的研究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對哲學本身的研究。因此，哲學史的科學研究應擺脫只是轉述或復述他人思想這種剪子加漿糊的研究模式，而應與歷史上的哲學家進行現實的對話。我導師湯一介先生也曾多次向我強調了這一點。因此，在研究《知識論》一書的過程中，我努力嘗試着把金岳霖討論的哲學問題看成是我自己的問題。同時，我也深深地相信，任何一個哲學問題都不可能給予終極性的答案。對每一哲學問題，我們都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或層面進行深入的探討。基於這種考慮，我在做博士學

位論文時，採取了與金岳霖進行對話的形式。當然，我不滿足於僅僅以一個哲學家研究者的身分與金岳霖進行對話，而是努力著以一個哲學家的身分與之對話，對他的某些理論提出了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當然，我的努力未見得有成效。同樣，我的某些看法也未必就是正確的。然而應看到，這種對話的形式畢竟有利於哲學探討的深入展開。

這種深入探討、研究的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就是研究者本人哲學修養不斷提高的過程。在做博士學位論文時，我感覺到自己的哲學修養有所提高。果真如此，那麼，這一方面應歸功於我導師湯一介先生的教誨，另一方面也應歸功於金岳霖先生，因為正是在研讀他的哲學著作中，我學到了不少有益的東西。

現在，擺在讀者面前的《金岳霖》一書主要是由我的學位論文組成的。這幾篇學位論文，從選題到撰寫，都是在我導師湯一介教授的嚴格指導下進行的。湯先生嚴謹的治學態度和方法給了我深深的影響。先生的諄諄教誨之恩，實非弟子言語所能表達。在論文撰寫過程中，我也曾得到了張岱年、朱伯崑、樓宇烈、申正等教授的幫助與指導。在此一併致謝。

需要指出的是，金岳霖的哲學體系完成於四十年代。一九四九年之後，他放棄了以前的哲學思想。而且基本上說來，他也不再以一位哲學家的身分出現。綜觀其一生，可以說金岳霖是個哲學家，是個學者，而其後半生則主要關注於社會政治活動。《金岳霖》一書研究的是作為哲學家的金岳霖及其哲學思想。

最後要感謝傅偉勳和韋政通兩位先生，承蒙他們的雅意，邀請我撰寫《金岳霖》一書，並將此書納入東大圖書出版公司的「世界哲學家叢書」之中。此書的出版問世也得益於東大圖書出

4 金 岳 霖

版公司及各位編輯的辛勤勞作，在此特向他們表示深深的謝意。

胡 軍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於哈爾濱師範大學

導 言

中國現代哲學的發展，受到了西方哲學很大的影響。在本世紀的二〇年代、三〇年代，西方哲學的各大主要流派都已紛紛地被介紹到中國來了。此時的中國哲學界以翻譯和介紹西方哲學為主。到了三〇年代末、四〇年代初，中國哲學逐漸走上了一條成熟的道路，其標誌就是一些哲學家融會貫通了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而創建了自己的哲學思想體系。應該說，這些哲學思想體系的建立對促進中國哲學的進一步發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在這些體系中，金岳霖的哲學體系最嚴密、最富獨創性，它代表了中國現代哲學發展的高峰。他的這一體系是由《邏輯》（1937年）、《論道》（1941年）和《知識論》（1948年）三部著作構成的。

金岳霖，字龍霖（1895年—1984年），出生在湖南長沙市。父親金聘之是清朝末年的一個官吏，原籍浙江省諸暨縣，後來在長沙任湖南省鐵路總辦。金岳霖在兄弟中最小，排行第七。

金岳霖早年在長沙雅禮學校、明德學校學習，1911年轉到北京清華學校，1914年畢業。同年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學政治，1917年得學士學位。後又進哥倫比亞大學繼續深造，1918年得碩士學位，1920年得政治學博士學位。1921年後遊學英、德、法、意等國。在英國的劍橋大學作過較長時期的研究。1925年底回國。

金岳霖先生是我國當代著名的哲學家、邏輯學家。他畢生致

2 金岳霖

力於我國的哲學、邏輯學的教學和研究，曾歷任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教授、文學院院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哲學研究所副所長、中國邏輯學會會長和名譽會長等職。

金岳霖最初是專攻政治思想史的。他的博士學位論文就是討論 T. H. Green 的政治思想。Green 不僅是一位政治思想家，也是一位哲學家，其哲學傾向於新黑格爾主義。因為研究 Green 的政治思想，金岳霖開始接觸哲學，由此引發了他對哲學的濃厚興趣，他甚至自稱是「哲學動物」。他說：「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學動物，我自己也是一個，就是把它們放在監牢裏做苦工，他們腦子裏，仍然是滿腦子的哲學問題」^①。由於受 Green 的影響，他的哲學思想也傾向於新黑格爾主義。

1922年在英國進修期間，他的興趣轉向哲學及邏輯。當時他受到了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很大的影響。其中休謨 (David Hume)、羅素 (Bertrand Russell) 的哲學對他的哲學思想的形成、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在回憶這一情形時，他說：「民國十一年在倫敦唸書，有兩部書對於我的影響特別的大；一部是羅素底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一部是休謨底 *Treatise*」^②。由於羅素哲學思想的影響，金岳霖「在思想上慢慢地與 Green 分家」，即離開了新黑格爾主義思想，而從此以後「著重分析」，認為「哲理之為哲理不一定要靠大題目，就是日常生活中所用的概念也可以有很精深的分析，而此精深的分析就是哲學」^③。這

① 金岳霖〈唯物哲學與科學〉《晨報副刊》，57期，1926年6月。

② 金岳霖：《論道》，頁3，商務印書館，北京，1985年8月。

③ 同上。

是金岳霖哲學思想發展歷程上的一個重要的轉折。「分析就是哲學」的思想是對黑格爾以來的思辯哲學的一個反動，它是分析哲學的最重要的特徵之一。

在注重分析方面，除羅素外，摩爾（G. E. Moore）給金岳霖的影響也是很大的。摩爾和羅素共同開創了哲學上「分析的時代」，對分析哲學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但他們兩人在方法上卻有很大的差異。摩爾早期形成其思想訓練的是語言學和古典學，而羅素的訓練則主要是數學方面的。摩爾的思想更像一位精細的、對日常語言有非凡能力之語言學家的思想，而羅素的思想則更類似於一位數學家的思想。摩爾求助於常識的世界觀，著重日常語言的分析，而羅素則主要訴諸於邏輯數學，著重形式語言的分析。從金岳霖的《論道》、《知識論》等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摩爾和羅素對他的影響。然而從思想的細膩和文風上說，金岳霖似乎更與摩爾相似，所以他素有「中國的摩爾」之雅稱。金岳霖跟摩爾一樣，膽跟心一樣的細，每說一句話，總要填滿了缺陷，補足了罅縫，不留絲毫可指摘的地方，說著一句，又縮回了半截，用了一個字，倒解釋了一大套，兜著數不清的圈子，極少直截痛快地一口氣講下去。你找不出一句廢話來，偏又覺得繁瑣。他們似乎不僅把理由告訴我們，並且要把理解力也灌輸給我們。摩爾和早期的羅素都是新實在論者，因受其影響，金岳霖也常把自己的哲學稱為實在主義的哲學。

在金岳霖哲學思想的形成過程中，休謨哲學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他的很多哲學問題都是直接從批判休謨哲學出發的，如他的本體論哲學就是主要用來解決休謨的歸納問題、因果問題。他的知識論所論及的許多重要問題也都與休謨哲學有很深的理論淵

源關係。在談到休謨哲學的影響時，金岳霖說道：

「休謨底 *Treatise* 給我以洋洋大觀的味道，尤其是他討論因果的那幾章。起先我總覺得他了不起，以後才發現他底毛病非常之多。雖然如此，他以流暢的文字討論許多他自己所無法解決的問題，一方面表示他底出發點太窄，工具太不夠用，任何類似的哲學都不能自圓其說，另一方面，也表示他雖然在一種思想底工具上自奉過於儉約的情況下，仍然能夠提許多的重大問題，作一種深刻的討論，天才之高，又使我不能不敬服。」^④

除受休謨、羅素、摩爾等人的影響外，金岳霖還程度不等地受到了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康德、劉易斯 (C. I. Lewis)、維特根斯坦等人的哲學思想的影響。

對於中國傳統哲學，金岳霖自謙地說道：「中國思想我也沒有研究過」，只是「生於中國，長於中國，於不知不覺之中，也許得到了一點兒中國思想底意味與順於此意味的情感」^⑤。但從他於 1943 年所寫的〈中國哲學〉一文可以看出，他對中國傳統哲學有著很深刻的瞭解。在《論道》一書中，他運用了大量的中國傳統哲學概念來表達自己的哲學思想，這是他努力融會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來改造和重建中國哲學的可貴嘗試。

紹述融會，貴在創新。人云亦云、拾人牙慧是決計造不出真正的哲學家的。學習西方哲學是爲了借鑒，繼承中國傳統哲學

④ 同上，頁 4。

⑤ 同上，頁 16。

是爲了創新。正是在此基礎上，於三〇年代末、四〇年代，金岳霖創建了自己的哲學體系。《邏輯》、《論道》和《知識論》是他的哲學體系的三部代表作。此外在 1948 年底之前，他還撰寫了約三十來篇文章。這些文章的內容大致說來都集中體現在上述的三部著作中。

金岳霖把哲學劃分爲邏輯學、本體論、知識論、美學、倫理學等部門^⑥。但他自己的哲學體系則由三個部分，即邏輯學、本體論和知識論組成的。《邏輯》一書是他的邏輯學理論的集中體現，《論道》代表他的本體論，而《知識論》則系統地表述了他關於知識的理論。金岳霖這一哲學體系的構成顯然是受到了西方哲學的影響。這是無疑的，因爲把哲學分成邏輯學、本體論、知識論等幾大類本來就是西方哲學家們的看法。問題是金岳霖的這一體系爲何僅由這三部分組成而不包括他認爲應屬於哲學的倫理學、美學等部門呢？我認爲，所以如此者，是和金岳霖對於中國哲學的特點之看法有密切的關係。

在〈中國哲學〉一文中，他指出：「中國哲學的特點之一，是那種可以稱爲邏輯和認識論的意識不發達」，認爲在先秦尚「有一批思想家開始主張分別共相與殊相」，然而這一關於共相與殊相的討論卻「過早地夭折了」，所以中國哲學的「邏輯、認識論的意識不發達，幾乎一直到現在」。而西方則不然。

「歐洲人長期用慣的那些思維模式是希臘人的。希臘文化是十足的理智文化。這種文化的理智特色表現為發展各種觀念，把這些觀念冷漠無情地搬到種種崇高偉大的事情上

⑥ 參見金岳霖《知識論》，頁 6、頁 16。

6 金岳霖

去，或者搬到荒誕不經的事情上去。歸謬法本身就是一種理智手段。這條原理推動了邏輯的早期發展，一方面給早期的科學提供了工具，另一方面使希臘哲學得到了那種使後世思想家羨慕不已的驚人明確。如果說這種邏輯、認識論意識的發達，是科學在歐洲出現的一部分原因，那麼這種意識不發達也就該是科學在中國不出現的一部分原因。」^①

所以要改造中國傳統哲學，要促進科學在中國的蓬勃發展和長足進步，就必須要打破在中國延續了二千年之久的這種邏輯、認識論意識不發達的狀況。而邏輯、認識論的中心問題就是共相與殊相的關係問題。金岳霖的由邏輯學、本體論和知識論構成的哲學體系就是為了完成這一歷史使命。《邏輯》是我國第一部比較詳細、比較系統地討論邏輯理論的著作，它第一次在我國引進了數理邏輯，我國早期的數理邏輯學家幾乎都直接地受到了此書的影響。《知識論》是迄今為止中國哲學界中關於知識論的第一部系統嚴密的專著。《論道》一書也應該說是中國哲學界中首先系統地論證共相與殊相關係理論的著作。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金岳霖是打破中國哲學中邏輯、認識論意識不發達這種狀態的第一人。因此他的《邏輯》、《論道》和《知識論》這三部著作在中國哲學發展的歷史上是有開創性意義的。

從寫作和發表的時間而論，《邏輯》一書在前，它發表於1935年。《論道》一書約完成於1938年，1940年發表。《知

^① 金岳霖〈中國哲學〉，《哲學研究》，1985年第9期。

識論》完成於抗日戰爭期間(約在1940—1945年間)，我們現在所見的《知識論》一書是重寫稿，1983年11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但從思想發展的邏輯順序而論，金岳霖認為，他是用「《論道》那樣的唯心主義的世界觀和《知識論》那樣的唯心主義的認識論來寫《邏輯》這本書的」^⑧。(參見金岳霖〈對舊著「邏輯」一書的自我批評〉，載於《邏輯》，三聯書店，北京，1961年)

《邏輯》一書主要介紹和引進西方的邏輯思想，其中第四部分主要是金岳霖自己關於邏輯學的理論。但總括講，此書還是以介紹西學為主。《論道》和《知識論》雖受到了西方哲學的很大影響，但主要是金岳霖自己的理論創造。

《知識論》是金岳霖的一部重要之哲學著作。他說：「《知識論》是一本多災多難的書」，「是我花費精力最多、時間最長的一本書」^⑨。《知識論》主要論述共相和殊相的分別和聯繫的問題。它指出：「知識論的對象是知識，是普遍的知識底理。理是普遍的，而知識現象就其發生於某時某地說是特殊的，問題是在特殊中去普遍」^⑩。知識論的對象是「知識底理」，而所謂「知識底理」即是「共相底關聯」^⑪。因此，知識論的主要任務就是要在殊相中去求「知識底理」或「共相底關聯」。那麼什麼是共相或共相的關聯呢？《知識論》對此雖有所論列，但對之並未作充分而系統的闡述，因為它的主要任務是從認識論的角度探討如

-
- ⑧ 參見金岳霖〈對舊著「邏輯」一書的自我批評〉，載《邏輯》，三聯書店，北京，1961年。
- ⑨ 金岳霖〈「知識論」作者的話〉，載《知識論》。
- ⑩ 金岳霖：《知識論》，頁20，商務印書館，北京，1983年。
- ⑪ 同上，頁90。